

# 基于传统和现代时尚共生的婚礼旗袍创新设计

周伟, 严昉

(浙江理工大学 服装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以婚礼旗袍为研究对象,立足设计学研究视野,对文献史料、实物及图像史料等进行整理和分析。研究指出,婚礼旗袍作为礼服,其形制最早出现于《服制》之中,随后在全国各地各民族中衍生出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成为婚俗时尚,在上海、北京等沿海及发达城市甚至出现“集团婚礼”等对婚礼旗袍的集体选择现象。基于此,引入纵、横向设计理念,探讨婚礼旗袍在民俗文化传统基础上的时尚传承与创新,提出社会背景与生活方式变革对服饰发展的重要性,并从设计文化、设计风格、设计材料3个方面解析传统与时尚异质共生的思维和方法,以期今后中华婚礼旗袍的时尚设计提供理论和思维借鉴。

**关键词:** 旗袍;婚礼;民俗;时尚;共生

**中图分类号:** TS 941.28; G 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1928(2023)02-0175-06

## Innovation Design of Wedding Cheongsam Based on the Symbiosis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Fashion

ZHOU Wei, YAN Fang

(School of Fashion Design and Engineering,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takes the wedding cheongsam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design, collates and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objects and images. The study points out that the wedding cheongsam, as a dress cheongsam, its shape and form first appeared in the *Dress System*, and then developed a rich and colorful folk culture among all ethnic groups across the country, becoming a wedding fashion. In Shanghai, Beijing and other coastal and developed cities, there are even collective choices for wedding cheongsam such as "group wedding". Based on this,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design concepts are introduced to discuss the fashion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wedding cheongsam on the basis of folk culture tradition, and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background and lifestyle change is put forward, and the thoughts and methods of fashion heterogeneous co-existence from three aspects of design culture, design style and design materials are analyzed,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theoretical and thinking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fashion design of Chinese wedding cheongsam.

**Key words:** cheongsam, wedding, folk customs, fashion, symbiosis

旗袍自20世纪20年代创制以来,经过几年的普及和传播,迅速成为中国女性最为穿用的服饰单品之一<sup>[1]</sup>。以新闻界为主的学界在民国时期针对旗袍的起源、功能、设计、文化等已经展开了一些探讨,20世纪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旗袍的历史、技艺等学术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针对婚礼旗袍,张竞琼等<sup>[2]</sup>、李婧晗<sup>[3]</sup>对民国时期婚礼旗袍

的历史、流行、搭配、形制等作出了梳理;徐倩倩<sup>[4]</sup>、唐成俏<sup>[5]</sup>等结合旗袍在国内外市场中的应用现状,从实践层面探讨了旗袍设计元素如何更好地表现在现代婚礼服中,为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文中重点从设计文化及设计思维的角度溯本清源,思考旗袍与民间婚俗的关系,解读旗袍婚俗在传统与当代不同语境中的转化,以此提出传承与创新的价

收稿日期:2022-11-10; 修订日期:2023-02-02。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1JZD048)。

作者简介:周伟(1977—),女,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时尚设计与文化。Email:vinazhou6@163.com

值及要义。

## 1 婚礼旗袍的历史文化传统

彰显身份的服饰是民俗生活的重要构成,婚礼旗袍依托婚礼这一人生重大礼仪习俗势必延伸出丰富的文化内涵,而这些符号语义是当代对婚礼旗袍进行设计创新的重要前提。

### 1.1 民国《服制》对旗袍作为礼服的规定

在官方记载中,旗袍最先是作为女子礼服的选择方案,如图1所示。1929年第2次《服制》<sup>[6]</sup>颁布,女子礼服之乙种便是“齐领,前襟右掩,长至膝与踝之中点,与裤下端齐,袖长过肘,与手脉之中点,质用丝麻棉毛织品,色蓝,纽扣六”的旗袍[见图1(a)],且此时的制服也为旗袍。1942年,随着第3次《服制》<sup>[7]</sup>的颁布,旗袍已经在制服上成为女子礼服的“唯一选择”。此时旗袍礼服的形制为“袖长至腕,本色直条,明纽八至十。其他与常服同”;常服规制为“齐领,前襟右掩,长至踝上二寸,袖长至腕。夏季得缩短至肘或腋前寸许。本色一线滚边(缃边),质用毛丝棉麻织品,色夏浅蓝,冬深蓝。本色直条,明纽三”[见图1(b)]。依据记载,笔者在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108件旗袍传世实物中遴选了3件符合规制的旗袍(见图2),形制均为齐领,前襟右掩,长至膝下踝上,袖长过肘近腕。其中,样本1旗袍征集自齐鲁地域,色浅蓝,提花绸料,明纽9,设于7处(其中领口1处3副),腰身平直;样本2旗袍征集自皖南地域,色深蓝,夹棉,明纽6,设于6处,腰身平直且较样本1稍有曲率,符合第2次《服制》规定的旗袍;样本3旗袍征集自江南地域,色深蓝,棉质,明纽10,设于10处,有明显腰身,最符合第3次《服制》所规定的旗袍样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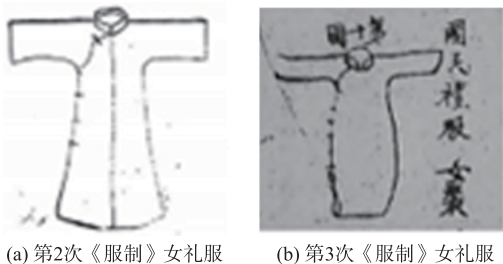


图1 《服制》规定旗袍礼服样式

Fig. 1 Style of cheongsam stipulated in the Dress System

针对旗袍的颜色,复观当下女性婚礼服,不管是旗袍还是其他华服,红色似乎成为首选,并非民国《服制》多次强调的蓝色。与此同时,虽然《服制》规定旗袍作为礼服可用于包括婚礼在内的一般礼

仪场合,但也无法确认民国女性婚礼旗袍就一定选用蓝色。从大量图像及实物史料看,民国时期的婚礼旗袍在色彩上或选用浅黄、米白等淡雅色调,或采用藏青、紫红等深色色调,且以浅色系为主,并没有严格遵照《服制》规定的蓝色,也没有当下浓烈的尚红情结。据载,20世纪50年代以后结婚才开始讲究穿红色旗袍<sup>[8]</sup>。



图2 符合《服制》规定的旗袍礼服实物样本

Fig. 2 Material object of cheongsa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Dress System

### 1.2 各民族及地方婚俗中的旗袍文化

旗袍源自清代满族之袍,因此旗袍在满族婚俗中的应用更为广泛,蕴含的民俗寓意也更为多彩。在满族人的订婚习俗中,除了准备“养钱”外,还需要准备一系列物品,如“四季成衣各一套,其中包括国花缎旗袍、库缎小褂、月细布布衫、漂白布布衫”<sup>[9]</sup>。在正式订婚仪式“换盅”及“认亲家”时,“炕上放一小桌,两亲家对坐,双方把肥大的旗袍衣襟铺在桌上,接着上菜,菜盘要压住衣襟,两亲家往酒杯倒酒,端起来,互相换盅,一饮而尽”<sup>[10]</sup>。旗袍的作用发生了延展,具有了沟通、联结结亲双方情感的功能,形成某种象征关联的符号载体。满族新娘入洞房后还有很多规矩,在“磕头”环节,新娘需要脱下红衣裳,换上彩色旗袍,头戴宫花,陪新郎向祖先堂磕头,俗称“认宗”<sup>[11]</sup>。可见,旗袍在满族婚俗的各环节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除了汉族与满族,其他民族女性选择旗袍作为婚礼服也常有之。在土家族婚俗中,陪嫁的妆奁中至少要有两套有衿的长旗袍、两套毛蓝布旗袍<sup>[12]</sup>。《励江岸村志》记载婚礼仪式时谨告:“新娘子卸装穿长衣旗袍,酒席每出一次汤,新娘子出一次场,换一套衣裳,这叫‘姑娘拜汤出汤(趟)换套’,显示新娘嫁衣的雍贵。”<sup>[13]</sup>彝族的新娘喜着盛装,新婚时常身穿大红色旗袍,并搭配彝族银鼓帽等盛装头饰、耳坠银饰、围腰银链、绣花毛边布鞋等<sup>[14]</sup>,展现了民族服饰之间的搭配组合。

汉族各地方还有将旗袍与传统华服进行换穿和搭配的习俗,如将旗袍作为内搭,外搭古典华丽的凤冠霞帔,在当时成为一种时兴的穿搭方式。在

山西,还有将“凤冠霞帔”改为“花冠旗袍”者<sup>[15]</sup>。在浙江宁波服装博物馆珍藏一件民国女性婚礼服,巧妙地将传统上衣(夹袄)下裳(栏杆式马面裙)改制拼合成一件旗袍,立领盘口,大襟右衽,长衣长袖,通身选用大红绸料,以盘金绣为主,装饰八仙(何仙姑)、牡丹和江崖海水纹等,寓意婚姻长久、夫妻好合,整体风格喜庆华贵。

旗袍自民国初期产生以来,已有近百年历史,在全国各民族各地域的演绎下,不仅改良创新出卓尔多姿的款式造型和繁花似锦的装饰细节,在婚俗文化的演绎上也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俗及地域符号,成为女性婚礼服饰不可或缺的重要选择。

1.3 民国“集团婚礼”中的旗袍时尚

“集团婚礼”是集体结婚的一种,也称“集团结婚”,首倡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上海。1935 年,上海社会局参考意大利集团结婚办法,同时推行新生活运动,颁布《上海市新生活集团结婚办法》,规定“每年元旦、总理诞辰、孔子诞辰、双十节四日为结婚日”<sup>[16]</sup>。同年上海举办全国首届集团结婚典礼,57 对新人着统一服装,一众新娘身着粉色软缎旗袍,头披西式婚纱,手持鲜花<sup>[17]</sup>。“集团结婚”在上海、北京、南京、杭州、天津、广州等沿海及经济相对发达、社会风尚相对开放的城市频频举办,且往往由当地政府组织,并由市长、社会局长及其夫人担任证婚人,引来成百上千人观看,颇具影响力。为了与新娘呼应,集体婚礼中的新郎着装通常为中式的长袍马褂(见图 3<sup>[18-20]</sup>)。相较以往装饰繁缛的凤冠霞帔,裁剪制作简单、款式结构修身的旗袍和长袍马褂成为当时新式婚礼理念的重要体现,是对追求节俭和实用的“新生活运动”的有力实践。同时,这种官方与民间的互通、新政策法规与新民俗习惯的并举,也是对女性选择旗袍作为婚礼服的重要助推,构建和加强了旗袍在女性婚俗中的存在价值。因此,“集团结婚”成为 20 世纪 30—40 年代中国的新婚俗时尚之一。



(a) 1935 年第 2 届“集团结婚”



(b) 1940 年新运 6 周年举办“集团婚礼”



(c) 1941 年首都第 1 次集团结婚礼

图 3 民国时期“集团婚礼”中的旗袍

Fig. 3 Cheongsam in the "group wedding"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2 现代婚礼旗袍创新设计的时尚共生理念

中华传统婚俗虽因民族、地域的不同而各异,但由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组成的“六礼”是最基本的婚礼习俗,程序上稍显烦琐,此外凤冠霞帔等复杂的服饰配饰也是烦琐旧俗的重要构成,对其一成不变的保留,已不符合现代人的要求。因此,需要引入古、今共生的纵向理念,不同生活及风格共生的横向理念,采用发展和革新的眼光继承传统婚俗中诸如和合文化、家文化在内的优秀基因,结合当下文化背景打造新时代婚姻礼俗文化,从而引领传统与现代时尚共生下的婚俗新风尚。婚俗文化的承袭与共生思路如图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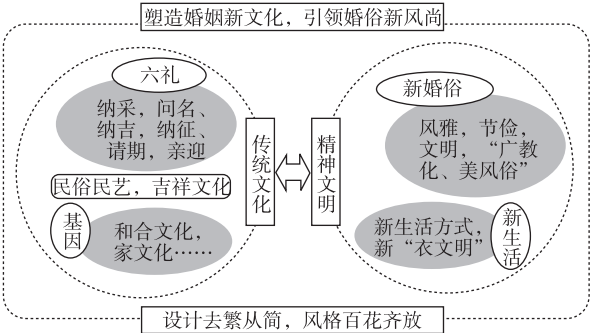


图 4 婚俗文化的承袭与共生

Fig. 4 Inheritance and symbiosis of marriage culture



## 2.1 共生的纵向理念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西方时尚的再次东渐,服饰设计中的时代感被空前强调,旗袍等传统服饰话语被逐渐削弱<sup>[21]</sup>。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新娘一般穿白色婚纱,礼成之后才会换上红色旗袍或套装<sup>[22]</sup>,所幸旗袍在婚礼中的话语虽然削弱但并未消失。浙江籍作家陆苏<sup>[23]</sup>认为旗袍是新娘给自己古典情结“最后的安慰”,甚至觉得“没有什么比旗袍更能读懂女人的心事”。尽管旗袍在现代人生活中的使用频率已远不及民国时期,但是新娘将旗袍作为婚礼服的选择是“从一而终”的。“无论时尚如何变幻,旗袍始终是以传统的形制、实在的内容和精湛的手工为美。近年来,在婚礼仪式特别是其中的敬酒仪式上,红色的旗袍、汉服、凤冠霞帔、秀禾服等中式礼服成为女性婚礼服的重要选择<sup>[24]</sup>,旗袍作为婚俗的一部分仍被不断地传承。婚俗作为人生礼俗的重要构成,是当下人们关注的最重要的民俗事项之一。传统婚礼民俗五彩缤纷,其中有优秀的内容,也有糟粕的方面。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车轮上,也需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新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重新演绎中国婚俗。因此,旗袍作为婚俗的一部分,也首先需要实现文化语境转化,承旧纳新,引领婚礼旗袍时尚创新,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继承和弘扬。

## 2.2 共生的横向理念

在同一时空里,设计师需要敏锐的观察能力,满足不同消费群体对不同婚礼旗袍的需求,践行婚礼旗袍时尚创新。婚服作为女性婚礼的“战袍”,婚礼旗袍应该关注不同女性群体自身的风格、喜好和品位。婚礼旗袍的设计对象除了年轻人,还需要考虑晚婚、再婚、“黄昏恋”等人群以及需要重拍婚纱照的中老年人。因此,在旗袍设计里不仅要实现“民族性”与“时代感”交互共生的纵向理念,还要充分采用横向理念分析不同对象的设计需求。步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第 1 个“十年”的品牌化建设,以及第 2 个“十年”的文化自信发展,契合中国人自己生活方式的“中国风格”时尚设计逐渐被市场和社会接受。工业、农业及信息文明并存,艺术思潮百花齐放,以及物质水平的稳步提高,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浙江理工大学崔荣荣教授曾提出当下 4 大生活方式:①生态健康层次化——满足生理功能需求的提升;②社会需求多元化——满足安全社交的功能需求;③生活方式个性化——满足尊重与自我需求功能;④精神追求艺术化——实现自我价值的精神需求。进而提出了新时代 5 个维度的“穿衣哲学”:

①生活穿衣——生理满足;②安全穿衣——功能保障;③社交穿衣——情感归属;④自信穿衣——尊重需求;⑤个性穿衣——自我实现。因此,立足新时代的历史需求、人们生活的社会需求,开展婚礼旗袍的时尚创新是最根本的价值导向<sup>[25]</sup>。需要强调的是,人们对于设计和时尚的需求往往不是一维的,而是多维度的,因此婚礼旗袍设计师必须具有多维度交叉融合的共生理念,使自己的设计始于不同生活方式的指导,终于不同生活方式的共生。

## 3 现代婚礼旗袍创新设计的时尚共生方法

设计理念决定设计方法,在完成纵、横向设计理念的转化后,设计师可以从设计文化、设计风格及设计材料等层面开展具体的调研和设计。婚礼旗袍在细节设计时,造型、结构、色彩、装饰等方面具体的形式法则与实践方法多姿多彩。文中更多地立足古为今用的理念,聚焦异质共生设计,对婚礼旗袍的延伸设计、创意设计、艺术设计提供思路。

### 3.1 婚礼旗袍异质文化的共生设计

从历史角度看,从民国的“集团婚礼”开始,旗袍就深度参与新婚俗、新生活的建设,实现民族传统与当时新式婚礼文化的共生。而今,伴随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文明需求愈发丰富并逐渐细化,旗袍婚礼服文化也需要与时俱进,不仅要完成中西文化的共生,还需要考虑诸如主流文化与青少年亚文化<sup>[26]</sup>等异质文化之间的相互冲突与渗透。如文中“1 婚礼旗袍的历史文化传统”所示,所谓“古典情结”,更多是对文化的认可和美好生活的向往。言必有意、意必吉祥是中华传统服饰造物的精髓,传统女性以情感构建服饰设计的意向思维:从自然生态物象延展到对世俗世界、理想世界以及对宇宙天地的玄想,展现出女性极强的创造力,彰显出人们强烈的吉祥意识。因此,在开展现代婚礼旗袍的时尚创新设计时,要完成文化价值和设计哲学的构筑。例如,古人在设计包括旗袍在内的传统服饰之时,最擅用的设计方法便是基于汉字(语言、方言)的谐音迁想,部分举例见表 1;经笔者调研,其中举案齐(音同“旗 qí”)眉、旗开得胜等词语在一些地方婚俗旗袍的设计和应用中已经存在。质朴的人们希望通过旗袍这一媒介,将一切可以联系的美好事物、美好祝愿关联到每对新婚夫妇身上。民俗文化的构建往往具有地方性、随机性和延伸性(可迁想关联),故而对于旗袍谐音吉语的设计不必拘泥已有,有音同“旗(qí)”的鼓乐齐鸣、齐头



并进、齐心协力、兰桂齐芳等吉祥语汇同样可以被构建,形成现代社会的婚礼旗袍新民俗。从共生设计角度看,无疑是对古典文化在现实社会,他者文化在旗袍载体上的一种异质融入和共生。

表 1 基于谐音迁想的旗袍新民俗寓意构建

Tab.1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folk moral of cheongsam based on homophonic imagination

(旗 qi)谐音吉语	出处	谐音迁想构建新民俗寓意
举案齐眉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梁鸿传》	形容夫妻俩互相尊敬
齐头并进	周恩来《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形容几件事情或几项工作同时进行,可寓意夫妻齐心工作
旗开得胜	《射柳垂丸》	比喻事情(婚姻)刚开始,就取得好成绩
鼓乐齐鸣	郭沫若《虎符》第二幕	形容(新婚时候的)热闹景象
齐心协力	《墨子·尚贤》	(夫妻)思想认识一致,为了一个目标而共同努力
兰桂齐芳	《群音类选·百顺记·王曾祝寿》	(夫妻孕育的)儿孙同时显贵发达,又比喻子孙后代一起取得荣华富贵

3.2 婚礼旗袍异质风格的共生设计

旗袍因其立领、盘扣、大襟等传统元素,常被人们定义为民族风,并被赋予古典、优雅、性感等标签。虽然这种风格化的大众认知促使婚礼旗袍的社会认可度很高,但是作为消费产品,其艺术风格却被悄然固化。与此同时,风格化设计受到当下中国乃至国际时尚范畴,特别是以 Z 世代、千禧一代等为代表的青年时尚消费群体的追捧。现有类型化、风格固化的婚礼旗袍已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即无法满足其对服饰的风格化、个性化、艺术化需求。基于此,文中经过调研和采访提出时尚生活、艺术生活、品质生活 3 大层次需求,分

别整理了流行从众、简约几何、自然舒适等多种风格的婚礼旗袍演绎过程,并将其对应到不同的消费群体,以此拓宽婚礼旗袍时尚流行的宽度和广度(表 2)。如近年来深受甜酷辣妹小众文化喜爱的赛博朋克风婚礼旗袍,满足了 Z 世代女性对民族传统文化和时尚潮流文化的双重追逐。因此,除了常见的民族风,休闲风、街头风、朋克风、哥特风、性感风、甜酷风等新型风格同样可以融入婚礼旗袍设计,成为拓展婚礼旗袍消费群体、扩大婚礼旗袍影响力的重要抓手。易言之,婚礼旗袍共生设计的创新,应该是多元化、多风格的系统性构建,避免仅限于对民族风、古典风等传统风尚的一元阐释。

表 2 基于需求层次的风格化婚礼旗袍时尚设计需求

Tab.2 Stylized wedding cheongsam fashion design requirements based on demand level

婚礼旗袍时尚需求层次		多风格设计演绎	代表性消费群体
层次 1	时尚生活	流行从众、猎奇哗众、标新立异、前卫时髦等	时尚博主、健身达人、美妆爱好者、服饰爱好者、摄影爱好者等
层次 2	艺术生活	简约几何、风格思潮、古典艺术、个性搭配等	职场女性、高知女性、数码爱好者等
层次 3	品质生活	自然舒适、生态健康、体舒神怡、品味格调等	银发族(城乡老年人)、宝妈、家庭主妇、护肤成分党等

3.3 婚礼旗袍异质材料的共生设计

民国时期的婚礼旗袍最擅长的设计手法之一便是与西式的头纱进行搭配,但是这只属于服装与饰品,即品类的搭配。以此为灵感,当下的设计师可以将婚纱元素嫁接、拼缀在旗袍之上。周伟设计作品如图 5 所示。图 5 在廓型、立领、盘口、开襟上保留了旗袍的经典设计元素,将婚纱材料分别拼接在袖窿、袖口、底摆、领口等处,形成了系列“时装旗袍”的时尚创新设计。如果说“旗袍”和“婚纱”分别作为东、西方女性对于婚礼服装的物质想象,那么将这两种材质(款式)的元素进行融合,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的共生设计,可以满足新娘对中、西婚礼服的双重期许。此外,从设计风格角度看,蓬松、随意、外放的婚纱材质介入,使修身、挺括、内敛的旗

袍造型更加立体和丰富,增加了旗袍浪漫、自由、奔放的艺术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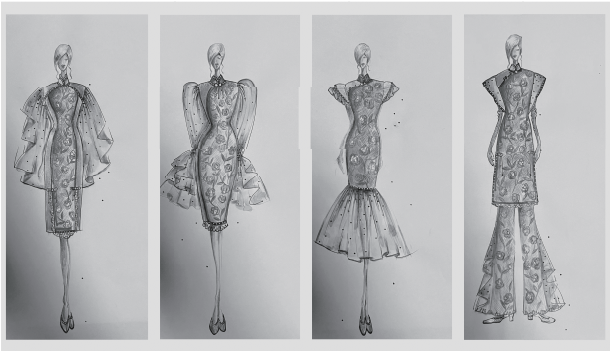


图 5 婚纱元素在旗袍中的设计嫁接

Fig. 5 Design grafting of wedding dress material in cheongsam

## 4 结 语

当下随着国风、国潮等中国风格时尚设计话语权的不断构建和深入人心,旗袍作为婚礼服的应用,除了已有的民族基因和传统文化加持外,更有流行市场和消费趋势的助力。因此,旗袍设计师、婚礼服设计师们需要以此为契机,一方面,要善于从文化、民俗等层面传承、创新和构建婚礼旗袍设计中的新婚俗、新民俗、新文化,引领“新时尚”;另一方面,深入调研不同人对婚礼旗袍的需求,特别是生活方式、艺术风格方面的时代化和个性化差异,并且需要清晰地意识到新的文化习俗、生活风尚、潮流风格是动态发展的。因此文中只是从理念和思维及方法层面进行引导和启发,而具体实现路径需要每位设计师自己去思考和探寻。

### 参考文献:

- [1] 王志成,崔荣荣,梁惠娥. 接受美学视角下民国旗袍流行的细节、规律及意义[J]. 武汉纺织大学学报, 2020, 33(6): 54-59.  
WANG Zhicheng, CUI Rongrong, LIANG Hui'e. Details, rule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popularity of cheongsam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eption aesthetics[J]. Journal of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2020, 33(6): 54-59. (in Chinese)
- [2] 张竞琼,李敏. 中国服装史[M]. 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 2018:138-140.
- [3] 李婧晗. 民国时期婚礼旗袍研究[D]. 北京:北京服装学院, 2012.
- [4] 徐倩倩. 旗袍在婚礼服设计中的应用探究[D].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 2014.
- [5] 唐成俏. 民国旗袍影响下的当代婚礼旗袍研究[D]. 长春:长春工业大学, 2017.
- [6] 佚名. 中央法规:服制条例[N]. 福建省政府公报, 1929-02-16(23-28).
- [7] 佚名. 国民服制条例(三十一年九月十七日公布)[N]. 国民政府公报, 1942-11-12(4-6).
- [8] 张世闪,李松. 中国民俗文化发展报告(2016版)[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8:96.
- [9] 宋德胤. 黑土文化[M]. 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2012: 41.
- [10] 汪玢玲. 中国婚姻史[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 429.
- [11] 姚斌,焦平,孟聪,等. 宽甸的满族和朝鲜族[M]. 丹东:宽甸县民族事务委员会, 1988:51.
- [12] 严正德. 青海百科大辞典[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4: 874.
- [13] 励江岸村志编纂小组. 励江岸村志[M]. 宁波:励江岸村, 2012:196.
- [14] 张永祥. 彝族文化发展管窥[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

社, 2009:69.

- [15] 黄东升. 山西经济与文化概论[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3:300.
- [16] 佚名. 沪社会局仿意国办法提倡集团结婚[J]. 当代法学, 1934, 1(1): 25.  
Anon. Shanghai Social Bureau advocates group marriage by imitating the Italian method [J]. Contemporary Law, 1934, 1(1): 25. (in Chinese)
- [17] 万建中,叶碧英. 中西婚礼文化[M]. 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3: 162.
- [18] 国际社. 第二届集团结婚[J]. 良友, 1935(105): 5.  
International Newspaper. The second group wedding [J]. Good friend, 1935 (105): 5 (in Chinese)
- [19] 卓世杰. 新运六周年:新运会主持之集团结婚礼[J]. 良友, 1940(152): 4.  
ZHUO Shijie. The sixth anniversary of the new games: the group wedding ceremony hosted by the new games [J]. Good friend, 1940 (152): 4. (in Chinese)
- [20] 佚名. 首都第一次集团结婚礼[J]. 新中华画报, 1941, 3(12): 9.  
Anon. The first group wedding ceremony in the capital [J]. New China Pictorial, 1941, 3 (12): 9. (in Chinese)
- [21] 王志成,崔荣荣,牛犁. 正名、融合与仪礼化:改革开放后旗袍文化形象的重塑[J]. 艺术与民俗, 2021 (3): 53-58.  
WANG Zhicheng, CUI Rongrong, NIU Li. Name rectification, blending and ritualization: remodeling the cultural image of cheongsam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J]. Journal of Arts and Folklore, 2021 (3): 53-58. (in Chinese)
- [22] 朱彦华. 承德民俗[M]. 北京:团结出版社, 2012: 116.
- [23] 陆苏. 我想要的生活[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 203-204.
- [24] 何晓晴,王革非. 北京女性中西式婚服市场需求偏好研究[J]. 丝绸, 2015, 52(10): 70-75.  
HE Xiaoping, WANG Gefei. Study on market demand preferenc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wedding dress of women in Beijing[J]. Journal of Silk, 2015, 52 (10): 70-75. (in Chinese)
- [25] 崔荣荣. 中华服饰文化研究述评及其新时代价值[J]. 服装学报, 2021, 6(1): 53-59.  
CUI Rongrong. Review of Chinese clothing culture research and its new era value [J]. Journal of Clothing Research, 2021, 6(1): 53-59. (in Chinese)
- [26] 游溪. 《闪光少女》:论异质文化的冲突与共生[J]. 电影文学, 2018(13): 113-115.  
YOU Xi. Flash girl: on the conflict and symbiosis of different cultures[J]. Movie Literature, 2018(13): 113-115. (in Chinese)

(责任编辑:卢杰)